

“央强地弱” 政府信任格局的 社会学分析^{*}

——基于汶川震后三期追踪数据

罗家德 帅 满 杨鲲昊

摘 要：个体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对高层与基层政府信任落差有显著影响。将汶川震后 30 个村庄数据纳入模型，发现拜年网规模、乡以上干部网规模、本村人信任对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有显著负向作用。建构个体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有利于使不同层级政府信任趋于平衡：合作性好的个体和社区有较多渠道解决自身的民生问题，在对接政府和各界资源时，能够显著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增加与政府的交流互动，从而增进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缩小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

关键词：政府信任 社区社会资本 个体社会资本 信任落差

作者罗家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 100084）；帅满，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讲师（西安 710049）；杨鲲昊，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一、引 言

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重大调整和重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持续深入的关键阶段，民众的政治和社会心态呈现内部分化态势，如不同群体、地域和时段的政府信任度存在分殊。而理解民众的政治信任并探寻背后的作用机制是转型期加强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应有之义。本文通过对汶川震后居民的追踪调查，从互动性的社会资本视角解释为何相较于中央政府，民众普遍较不信任基层政府。对基层政府的信任不足是当今社会治理的重大难题，其负面影响政策的推行及执行效能，本研究试图在清华大学乡村重建团队于汶川震后灾区收集

* 本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学科视野下的社会网络分析模型”（13ZD17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YJC84001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九批特别资助项目（2016T9089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sk2016027）的支持。

的三期追踪数据的基础上探讨其成因与机制。

2008年5·12汶川震后，国务院迅速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灾后恢复和重建的指导与政策落实工作，6月4日通过《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9月19日颁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进一步明晰抗震救灾的目标、职责和进度，中央政府半年内出台的扶持灾后恢复重建的政策多达88项；党中央和国务院统筹建立对口援建机制，震后三年共投入恢复重建资金10205亿元，19个援建单位投入825亿元，灾区接受捐赠797亿元；^①地方政府依据《四川省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工作方案（政府补助对象和标准）》，对地震中受灾的家户进行补贴。

中央和各级政府都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也取得了瞩目的重建成效，不过民众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并不一致，呈现为“央强地弱”、中央和地方都下降的总体趋势，^②这与政府信任的既有研究结论一致，也与清华大学乡村重建团队在汶川震后灾区跟踪调查的实证数据相符合（见表1）。

表1 政府信任年度数值

| | 年份 | 平均数 | 样本数 | 标准差 |
|--------|------|-------|-----|-------|
| 高层政府信任 | 2009 | 4.887 | 466 | .387 |
| | 2010 | 4.742 | 313 | .526 |
| | 2012 | 4.473 | 537 | .730 |
| 基层政府信任 | 2009 | 3.663 | 466 | 1.134 |
| | 2010 | 2.926 | 313 | 1.276 |
| | 2012 | 3.387 | 537 | 1.023 |

数据来源：根据《灾后重建纪事：社群社会资本对重建效果的分析》（罗家德等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一书中第109—119页资料整理。

中国的政府信任存在“央强地弱”的信任层级差现象，^③人们对“抽象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具体政府”的信任度，^④李连江称之为“差序政府信任”。^⑤

- ① 温家宝：《在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月报》2011年第11期。
- ② 参见罗家德等：《灾后重建纪事：社群社会资本对重建效果的分析》；尉建文、谢镇荣：《灾后重建中的政府满意度——基于汶川地震的经验发现》，《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1期；李智超、孙中伟、方震平：《政策公平、社会网络与灾后基层政府信任度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5年第4期。
- ③ Tianjian Shi,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3, no. 4, 2001, pp. 401-419; Lianjiang Li, “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 *Modern China*, vol. 30, no. 2, 2004, pp. 228-258.
- ④ 李汉林、魏钦恭：《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29页。
- ⑤ 李连江：《差序政府信任》，《二十一世纪》2012年第3期。

本研究运用社会资本概念解释为何相较于基层政府，民众对高层政府更加信任，从而形成一种不信任与自己关系近者却信任与自己关系远者的“逆差序”政府信任现象，提出以下观点：拥有个体、社区社会资本较多的人因为与基层政府接触多、了解较深，既能从基层政府得到资源，又有较多渠道解决自身的民生问题，较少依赖政府，从而对基层政府信任度较强，他们也有官方媒体之外的信息渠道去了解高层政府政策，因此减少了基层与高层政府信任的落差。我们以汶川灾后重建时期的乡村社区数据验证上述假设。

二、理论探讨与研究假设

对政府信任的解释主要有制度、文化、社会资本三种范式。制度理论基于理性人假设，认为民众根据政府的表现理性地判断政府是否值得信任并影响其信任水平的高低，^① 强调民众对物质利益的算计、政府承诺的判断和政府表现的评估会影响其政府信任。政府信任是人们对政治制度和政府绩效的一种理性的评估，如果一个政府的行为增加了民生福利、腐败得到控制，得到民众认可，则政府或制度的可信度会增加，就会有较高的政府信任。^② 因此，民众对政府职能和绩效的感知越明显、越满意，对政府绩效的预期与实际之间的落差越小，由此，政治合法性越高，政府信任度也越高。本土研究佐证了制度理论在中国的解释力，即经济增长、民生福利、惠民政策等政府绩效、公共政策、生活满意度指标对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

文化理论强调，“对政治制度的信任……根植于文化规范，并通过早期生活的社会化而得到传播”，由于社会文化的差异，政府信任在不同国家、社会和族群间会有所区别，^③ 其认为传统政治文化，^④ 国家对媒体的控制^⑤以及政治图像的生成和传播^⑥

① K. Newton and P. Norris, “Confidence in Public Institutions: Faith, Culture or Performance?” in S. Pharr and R. Putnam, eds., *Disaffected Democrac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 K. Newton, “Trust, 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2, 2001, pp. 201-214.

③ W. Mishler and R. Rose, “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Test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4, no. 1, 2001, pp. 30-62.

④ 应星：《“气”与抗争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9—154页。

⑤ J. J. Kennedy, “Maintaining Popular Support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and the State-Controlled Media,” *Political Studies*, vol. 57, no. 3, 2009, pp. 517-536.

⑥ John R. Hibbing and Elizabeth Theiss-Morse, *Stealth Democracy: American's Beliefs About How Government Should Wor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会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本土实证研究证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儒家传统思想对现有政治信任有影响，接触媒体的频率对政府信任呈负向显著影响，后续研究认为中央政府主导政治图像的生产，话语权的优势使中央政府较之于地方政府更有能力生产取信于民的政治图像。^①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在公民参与网络密集、社会资本建构比较好的地区，人们积极参与社团和公益事务，社会风气表现为互助、互信与合作。参与者之间直接或间接的交往越多，信息流通越充分，他们之间的互信就越大，合作也就更容易，以往合作的成果有利于未来的合作。社团、集社等参与公共事务而形成的横向联结的社会自组织有利于增强人们的信任感，团体信任产生的溢出效应会促进个人对社会和政治的信任。^② 胡荣等在本土研究中提出了社会资本影响政府信任的假说，发现“社团参与”因子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是负面的，但“公共事务参与”因子对于政府信任有正向显著影响，^③ 揭示中国语境下社会资本影响政府信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文化理论将政府信任分为宏观的国家文化和微观的人际社会化两个层面。^④ 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社会信任度在国际比较中偏低，属于小范围的、特殊主义的信任，没有形成普遍性的一般信任，因此国家文化层面的信任偏低；^⑤ 而基于特殊主义的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强信任又会阻碍横向团体的联结，不利于社会团体溢出效应的发生，对政治信任不会有太大的帮助。^⑥ 文化理论可以解释总体性的政府信任高低以及个体化的政府信任差异，但无法解释为何存在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间的落差。

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范式从网络、互动、认知的视角来看待政府信任。因为作为基层政府代表的政府官员在民众网络范围之内，通过与民众的互动增进了基层政

-
- ① 叶敏、彭妍：《“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的解析——关于央地关系一个新的阐释框架》，《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 ② R.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③ 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
- ④ W. Mishler and R. Rose, “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Test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pp. 30-62.
- ⑤ 参见 Max Weber,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1; 王飞雪、山岸俊男：《信任的中、日、美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84—99页。
- ⑥ 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第84—99页；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0—217页。

府可见度及其与基层政府的亲密程度,^①因此可以通过个体社会资本范围内的关系网络动员得到支持和资源,而高层政府及其官员都不在民众的网络范围之内,既不能对其施加影响,也动员不到资源,因此相对缩小了基层和高层之间的信任落差。相比之下,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范式为政府信任的层级差提供了解释的可能性。

本土研究证实了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范式对政府信任的共同影响,二者为兼容而非互斥关系。本研究沿着既有的理论脉络,探索民众与政府接触和互动如何形塑了其对政府绩效的感知和不同层级政府信任度高低的认知。梳理既有研究发现,制度理论的“政府绩效”测量指标相对一致,社会资本范式的测量指标和分析结果各异。^②寻找结构更清晰、稳定性更好的社会资本维度是推进既有研究必须破解的难题。帕特南定义的社会资本虽然主要指涉集体维度,但实际上表现为个体信任倾向、社会关系网络及蕴含其中的个体间的互惠。因此,我们认为,在研究政府信任时,社会资本应操作为个体社会资本和集体社会资本两个维度,且这两种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在学界已达成一定共识,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总之,本研究认为社会资本是人际网络在个体之间、社区层面的联系,应从个体和社区的层面出发,探析民众与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的关系、互动和认知如何通过资源获得、绩效感知来影响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的落差。

(一) 个体社会资本

个体社会资本指个体在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中占据的位置及其可动员的潜在资源。社会资本越多,代表个体拥有的社会支持越多。如果一个人的生活资源越匮乏,那么其剥夺感就会越强烈,既会丧失个人信心,也容易引发对政治的不满,从而降低其政府信任度。^③政治信任是个体的一种心理反映,若个体自身境遇不佳,政治信任感则容易受损,其强调的是个体政治效能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拥有社会资本多的人,被剥夺感越弱,政治效能感越积极、强烈,政府信任度就越高;与体现基层政府意志的地方政府官员互动多,频繁的接触和沟通形成了连带关系,^④从而增进互信度,体现在对政府官员的人际信任和对基层政府的组织信任。相比之下,个体对高层的了解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媒体渠道而非人际接触来获得的,因此,即便个体

① John R. Hibbing and Elizabeth Theiss-Morse, *Congress as Public Ene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45-162.

② 胡荣:《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③ 董毅:《基层民众的媒介接触与政治信任:基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1年,第22—23页。

④ Mark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8, no. 6, 1973, pp. 1360-1380.

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和网差大，接触到的信息数量多、异质性强，但对高层政府的信任不一定强，由此导致对高层和基层政府的信任落差缩小。

我们在实地调研中发现，村里精英群体认识的基层干部较多，且与部分官员有较好的私交，他们把对政府的印象拆解为对官员的信任，连带着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也较高。而普通村民认识的地方官员较少，政府对他们而言较为抽象，对各级政府的印象是“中央的政策好，但地方给搞歪了”。总体而言，在普通村民眼中，高层和基层的政府信任落差拉大，而精英群体的落差则较小。

假设 1：个体社会资本越多，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越小。

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是资源，个人可以通过目的性的行动从其镶嵌于其中的社会网络中动员和获取资源，获得权力、财富和声望方面的回报。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日渐成熟，且个体社会资本的作用在实证研究中也不断被证实。边燕杰、李煜提出“春节拜年网”概念，发展出城市居民春节期间的拜年网并以拜年交往者的社会结构地位来测量个体社会资本，包括拜年网规模、拜年网密度、拜年网网顶、拜年网网差等指标。^①

既有个体社会资本测量主要通过拜年网来进行，测量指标主要关注网络规模（拜年网规模）、网络密度（拜年网密度）及网络异质性（拜年网网顶、拜年网网差等）三方面，对权力关系则较少论及。我们参考既有研究，针对灾后社区恢复情况，结合权力关系在信息和资源获取中的重要性，除拜年网外，还测量了村民的工具网（help network）和情感网（discussion network，情感讨论网，简称情感网），并测量村民与干部关系的“干部网”，确定个体社会资本的三个测量指标：拜年网规模、关系网亲友比例、乡以上干部网亲友数。

本研究的“拜年网规模”指标延续了传统拜年网测量方法，“乡以上干部网亲友数”不仅反映网络构成的异质性，也凸显权力要素对信息和资源获得的重要性，“关系网亲友比例”亦是传统网络密度测量上的创新，且结合网络异质性要素，因为拜年网不区分地域因素，而关系网包括工具网和情感网，二者均以在地的社区成员为主，因此，村民关系网中亲戚朋友比例的均值一方面可以反映出村民关系网络的构成，即网络异质性，另一方面可以勾勒村民嵌入密网的程度。

拜年网规模测量的是给某个人拜年的人数，拜年网规模越大，则受访者从其社会网络中可动员的资源和支持就越多，这会带来良好的政治效能感和较高的基层政府满意度和信任度，从而减小基层和高层政府间的信任落差。

假设 1a：个体的拜年网规模越大，则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越小。

既有个体社会资本测量对权力关系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因拜年网网顶和网差

^① 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第 2 辑，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 年。

的测量依据是职业，权力关系的最直观体现是关系网中干部的亲友数量的多少，由于乡及以上干部才属于公务员，本研究提出乡以上干部网亲友数这一概念。在农村社区中，除职业区分，关系网中干部的数量是体现个体动员能力的关键要素，因此，关系网中的干部数量是衡量个体社会资本多寡的指标。一个人认识的干部多，尤其是具有亲友关系的干部在关系网中数量越多，那么其获取信息和资源的机会就越多。这意味着他与政府官员及其所代表的基层政府互动就越多、互信程度也越高，从而缩小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的落差。

假设 1b：个体的乡以上干部网亲友数越大，则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越小。

社会网理论中有强连带（strong tie）和弱连带（weak tie）之分，后者利于传递异质的信息，提供重复性低的资讯，在求职方面被证明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前者则能带来影响力，有利于资源的获取。^①然而，较多的强连带虽能因紧密圈子的形成而带来承诺和忠诚，但会因较少的结构洞而减损信息和资源的获取机会。^②关系网亲友比例越高，说明个体越深嵌于强关系的密网中，由此带来熟人间的信任，但同时也因和外界异质信息的隔离，较易相信媒体形塑的政府形象。依照文化范式中媒体相关理论，这会使个体拥有较高的高层政府信任度，从而加大高层和基层政府间的信任落差。关系网中亲友比例越低，则越不易受到密网的信息隔离束缚，其高层政府信任度越低，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越小。

假设 1c：个体的关系网亲友比例越小，则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越小。

（二）社区社会资本

社区社会资本是社区成员间的关系、社会网结构维度及社区内认知性社会资本，它能让社群内部彼此产生合作性，进而可能促成集体行动，使整个社区受益，其有三个维度：^③关系型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诸如关系网中认识的社区成员数量，个人的拜年网、工具网及情感网中认识的社区成员，因一个社区内拥有关系数量与质量高的人会更被动员参与社区活动，从而对社区有所贡献；结构型社区社会资本则是个人关系网中因社区成员的交往而产生的个人网密度，密度高表示一个人认识的社区成员也相互认识，此人因此深深嵌入在社区成员形成的封闭网络中；认知型社区社会资本则包括一个人对社区的认同感、信任感和亲密感，若认同感、信任感和亲密感高，就会参与更多的社区活动，对社区有利。而参与社区活动越多、越活跃，社会团体就容易产生外溢效果，增加社会信任和政府信任。但以下回归分析因为资

① Mark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pp. 1360-1380.

② R. Burt,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③ 参见罗家德、方震平：《社区社会资本的衡量——一个引入社会网观点的衡量方法》，《江苏社会科学》2014 年第 1 期。

料限制，将只分析关系与认知两个维度。^①

社区社会资本虽是社区拥有、受益的社会资本，但国内很多乡村社区是行政村，有的会大到上万人，要想用整体网方法测量整个社区的关系与社会网结构会非常困难，所以本研究将以个体网方法来测量社区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是体现在个人层面的关系与网络结构特质，但属于对整个社区有益的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个人层次的指标测量来获得。

社区社会资本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在汶川震后重建时期尤为明显。从中央、省市县到乡镇，各级政府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灾后的抢救、重建，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大量资源对灾区的注入。而资源的落实单位是社区，灾后政策宣传会、方案讨论会等都在社区维度进行。社区社会资本高的社区，内部网络联结多，互信程度高，人们也更倾向于参加集体活动，而参与社区活动多的成员有更多机会接触灾后资源对接的资讯和资源，从而拥有较高的基层政府满意度。

另外，社区是灾后恢复最主要的力量，社区社会资本高的人参与社区活动多，受益于社区提供的相互帮助；是合作的力量解决了重建期中很多民生问题，如此可以较少依赖基层政府的援助，减少了对政策期待与实际执行中的落差，从而降低对基层政府的不满与不信任。社区力量使得灾民生活在重建期中较快得到改善，增加了政府援助政策的效率与效能，所以社区参与度高的成员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提高。这些使得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的落差缩小。

假设 2：社区社会资本越多，与基层政府及其官员的接触和互动机会越多、基层政府信任越高，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就越小。

从关系维度看，在社区中有好的人际交往会带来较多的社区强连带。强连带会提升交往双方的信任感，一是因为强连带本身就代表着较长的交往历史与较高的互动频率，^② 双方相互了解的程度较高，对对方行为的预期也较准确，从而产生信任。二是因长期交往与频繁互动，加上互惠性的工具交换会培养出更强的情感，这会带来以情感为基础的信任。^③ 此外，强连带意味着影响力，一个人在社区中有较多的强连带，就相对地对较多的人有较强的影响力，可改变受影响者的行为，使之符合自己或大多数人的预期，从而减少受影响者的欺诈行为，增强信任感。信任感越强，被动员参加社区与公共活动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而增加与基层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

① 结构维度一旦加上，将损失 238 个样本（从 556 个有效样本降至 318 个），所以本研究不加入结构维度。

② P. Marsden and K. Campbell, "Measuring Tie Strength," *Social Forces*, vol. 63, no. 2, 1984, pp. 483-501.

③ D. Krackhardt, "The Strength of Strong Ties: The Importance of Philos in Organizations," in N. Nohria and R. G. Eccles, eds.,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2.

的接触机会,有利于对基层政府信任的培育。

假设 2a: 关系型社区社会资本越多,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越小。

社区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指涉:一是有较强的社区信任感,规范强的社区成员会相互监督,对违反规范的行为能立即察觉,对密网内的人形成强大压力,使其行为有可信赖性,^①这促进了有承诺的关系,^②这类关系蕴含着强大的保证性,^③有利于合作行为的稳定性和维持。二是社区认同感,主要表现为社区归属感,社区归属感是社区居民对本社区地域和人群集合体的认同、喜爱和依恋等,包括居住年限、人际关系、社区满足感、社区活动参与等。^④归属感越强,成员对社区内人际关系状况和关系结构形态的满意度越高,社区活动参与度也越高,这有利于关系型和结构型社区社会资本的增长,共同增进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

假设 2b: 认知型社区社会资本越多,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越小。

三、研究方法

(一) 数据

数据来自笔者所在研究团队在汶川震后灾区收集的三期调查数据。调查持续四年时间,每期数据间隔一年半左右,以便对重建不同阶段进行调查和追踪。2009年5月(一期)收集的是板房时期数据,当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并未采用“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Probability-Proportional-to-Size Sampling)法,而是根据村庄规模、受灾严重程度、交通便利程度等因素选取德阳市和绵竹市的12个村庄,每个村随机抽样33户,收集前测问卷83份,正式调查问卷475份,共收回有效问卷558份(回收率100%)。2010年11月(二期)收集的是房屋重建时期数据,是一期数据的追踪调查,共计追踪到12个村子的313份样本。2012年4月(三期)收集的是重建完成时期数据,除追踪调查的12个村庄外,还新增了成都市和阿坝州的18个村庄作为调研点。本期数据来自在四川省德阳的什邡市9个村庄、

① A. K. Mishra,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to Crises: The Centrality of Trust," in R. M. Kramer and T. R. Tyler, eds., *Trust in Organiz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6.

② Toshio Yamagishi and M. Yamagishi, "Trust and Commi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Motivation and Emotion*, vol.18, no. 2, 1994, pp. 129-166.

③ T. Yamagishi, Karen S. Cook and M. Watabe, "Uncertainty, Trust, and Commitment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04, 1998, pp. 165-195.

④ 丘海雄:《社区归属感——香港与广州的个案比较研究》,《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绵竹市 3 个村庄，成都彭州市和郫县 13 个村庄以及阿坝州茂县 5 个村庄，总共 30 个村庄中实施的一项问卷调查。调研得到 953 份问卷，有效问卷 949 份（有效率 99.58%）。

调查数据基本涵盖所有受灾地区的社区类型：德阳市、绵阳市是川西平原受灾较重的汉族聚居农村，以农业为主营经济；彭州市是成都市辖区内的受灾地区，有较多的服务业，也是川西平原的一部分；北川县和茂县则为羌人聚居的山区狭谷地带，以农业为主。我们根据村庄规模、交通便利程度进行方便抽样，每个村庄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 33 户进行入户调查，入户后再以 Kish 表选取一名成年人作为访谈对象。调查参考的是行政村中的村民名册，以此为抽样框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员由社会学专业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构成，访谈前经过了相关的专业培训。调查问卷是由研究团队自行设计的结构式问卷，根据相关的理论文献及测量工具进行设计，不仅收集村民家户的基本情况，还收集被访者的社会网络（工具支持网、情感讨论网、拜年网和干部网）、社会认知等方面的数据。

本研究将三期数据均纳入分析，尤以代表不同受灾类型且样本量较大的三期数据作为重点分析。之所以选择灾后重建完成的时期对受灾社区进行分析，主要是因为本研究的理论建基在个人和社区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基层政府对公共资源的分配上，从而影响社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而灾后重建过程是一个政府大量分配资源进入社区的时期，社区居民可以很深刻地感受到与基层政府的互动以及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在其他某些地区，如果公共资源十分贫乏，这样的互动与感受可能不那么强烈，不能凸显本研究探讨的“央强地弱”差序政府信任现象，因此重建后的这 30 个社区是一个较好的样本。

为避免被访者社会网络信息得不到完整呈现，本研究剔除三期数据工具网、情感网、干部网三个网络数据中有一项及以上缺失值的数据，同时，考虑到空巢家庭的特殊性，只有孤寡老人的部分家庭有缺失值时，本研究将其规模及三个网络数据标记为零，从而得到有效分析数据 556 条，由于政策执行公平性这一指标有 19 条缺失值，因此最终分析数据是 537 条。^① 表 2 是数据规模为 949 和 556 的描述统计量，包括性别、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是否中共党员、年龄等变量。从表 2 可以看出，各变量均值相差不大，相差稍大的“是否中共党员”也因方差较大，差距并不显著。可见，本数据并不存在选择性偏误。

^①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社会网络，最后得到 949 条数据，其中三网齐全的数据是 556 条。一期和二期数据的样本量较三期少，若再剔除三网不全的数据，则样本量太少，较难实现本研究目的。

表 2 数据规模为 949 和 556 的描述统计量

| 变量名 | 极小值 | | 极大值 | | 均 值 | | 标准差 | |
|--------|-------|-------|-------|-------|---------|---------|----------|----------|
| | 949 | 556 | 949 | 556 | 949 | 556 | 949 | 556 |
| 性别 | .00 | .00 | 1.00 | 1.00 | .5764 | .5845 | .49439 | .49325 |
| 教育年限 | .00 | .00 | 17.00 | 17.00 | 5.8734 | 5.7534 | 4.02429 | 4.02541 |
| 婚姻状况 | .00 | .00 | 1.00 | 1.00 | .9407 | .9618 | .23574 | .19079 |
| 是否中共党员 | .00 | .00 | 1.00 | 1.00 | .0843 | .1043 | .27798 | .30595 |
| 年龄 | 13.00 | 15.00 | 85.00 | 85.00 | 49.4384 | 51.2446 | 14.81488 | 15.46893 |

(二) 变量

1. 政府信任

关于信任的问项采用“完全信任”、“比较信任”、“一般”、“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五分定序回答，对其分别从 5 分至 1 分赋值，对象包括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村委会。首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五级政府信任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出两个因子：基层政府（此因子的权重主要在县/市政府、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村委会上）信任、高层政府（此因子的权重主要在中央政府、省政府上）信任。可见，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是有差别的，这和既有研究发现一致。为更好地反映政府信任变化，我们采用高层政府信任均值和基层政府信任均值指标，前者将村民对中央政府、省政府的信任程度进行均值化处理，后者将村民对县/市政府、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村委会的信任程度进行均值化处理。

2. 个体与社区社会资本指标及测量方法

本研究将个体社会资本操作化为“拜年网规模”、“乡及以上干部中亲友数”以及“关系网中亲友比例”。“拜年网规模”测量的是拜年网中给受访者拜年的人数，“乡及以上干部中亲友数”是指在干部网中，乡以上政府机构中担任干部的亲友人数，“关系网中亲友比例”是指村民在情感网、工具网中亲戚朋友比例的均值。

社区社会资本的指标包括：关系型社区社会资本用“关系网中本村人总数”进行测量，认知型社区社会资本用“本村人信任”和“社区归属感”进行测量。本次调查问卷中使用提名法（name generator）对村民的“工具网”和“情感网”进行询问。工具网主要涉及给其提供日常生活中的帮助（例如借钱或物品、帮忙农活、建房子、看小孩，等等）的人的相关情况，情感网主要询问的是与之谈心、聊私密话题的人的相关情况。考虑到工具网和情感网的相关度较高，将这两个网络合并为“关系网”，并计算其中本村人的人数得到关系型社区社会资本。对于社区归属感这一归为认知维度的社区社会资本变量，我们采用因子分析办法，从 17 道题目中归结出三个因子，社区归属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计算每位村民的因子得分，并进行百分化处理。本村人信任则是一个五点量表的问项。

3. 控制变量

政府信任的制度主义范式强调民众的政府绩效感知对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间的落差有负向影响，参考既有研究，我们将政府绩效感知操作为控制变量，包含“政策执行公平性”和“生活满意度”两个指标。纳入控制变量的人口学指标包括：性别、年龄、教育年限、是否中共党员、个体经济地位、职业性质。其中，职业性质区分为农民和体制内两个控制变量。

表3 所有变量一览

| 变量名 | 变量类别 | 变量说明 | 均值 | 标准差 |
|---------------|------|---|--------|--------|
| 因变量 | | | | |
| 高低层政府信任差值 | 定距变量 | 高层政府信任与基层政府信任的差值 | 1.086 | .975 |
| 控制变量 | | | | |
| 性别 | 定类变量 | 1=男, 0=女 | .583 | .493 |
| 年龄 | 定距变量 | 受访者的年龄 | 51.203 | 15.408 |
| 是否中共党员 | 定类变量 | 1=是, 0=否 | .108 | .311 |
| 教育年限 | 定距变量 | 受访者受教育年数 | 5.791 | 3.989 |
| 婚姻状况 | 定类变量 | 1=已婚, 0=未婚、离异或丧偶 | .962 | .190 |
| 政策执行公平性 | 定距变量 | 非常不公平、较不公平、比较公平、非常公平(分别从1—4赋值) | 2.581 | .804 |
| 生活满意度 | 定距变量 | 很不满意、不太满意、比较满意、很满意(分别从1—4赋值) | 2.976 | .621 |
| 体制内职业 | 定类变量 | 受访者职业类型 | .0234 | .151 |
| 农民职业 | 定类变量 | 受访者职业类型 | .746 | .435 |
| 个体经济地位 | 定距变量 | 5为最上层, 1为最下层 | 2.556 | .787 |
| 个体社会资本 | | | | |
| 乡及以上干部网规模 | 定距变量 | 乡及以上干部网中网络成员的数量 | .140 | .602 |
| 关系网亲友比例 | 定距变量 | 关系网中亲戚、朋友的比例 | .772 | .303 |
| 拜年网规模 | 定距变量 | 拜年网中网络成员的数量 | 28.981 | 29.394 |
| 社区社会资本 | | | | |
| 关系网本村人人数 | 定距变量 | 关系网中本村人的数量 | 1.894 | 1.243 |
| 对本村人的信任 | 定距变量 | 家人信任度(从低到高分别按1—5赋值)对本村人信任(从低到高分别按1—5赋值)的平均值 | 3.659 | .785 |
| 社区归属感 | 定距变量 | 根据因子分析得出, 1—100得分越高说明社区归属感越强 | 71.188 | 12.790 |

四、分析结果

表6变量间相关分析显示，高、低层政府信任差与社区社会资本中的本村人信任呈负向显著相关，与个体社会资本中的乡及以上干部网人数、拜年网总人数呈负向显著相关，与控制变量中的政策执行公平性、生活满意度呈负向相关，与年龄呈正向显著相关，与未婚者相比，已婚状态村民的高、低层政府信任差更大；社会资本中，社区归属感与关系网中本村人数、本村人信任均呈正向显著相关，乡及以上

干部网人数与本村人信任呈正向显著相关，拜年网总人数与关系网中本村人总数、社区归属感、乡及以上干部网人数、关系网中亲友比例均呈正向显著相关。针对前述假设，本研究构建四个回归模型，如表 4 所示。

表 4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

| 变 量 | 控制变量 | 个体社会资本 | 社群社会资本 | 全模型 |
|--------------------|----------|----------|----------|----------|
| | 模型 1 | 模型 2 | 模型 3 | 模型 4 |
| 控制变量 | | | | |
| 受访者性别 | .037 | .059 | .045 | .065 |
| 受访者教育年限 | .052 | .043 | .036 | .031 |
| 是否中共党员 | -.001 | .003 | -.001 | .004 |
| 受访者年龄 | .120** | .095* | .106** | .089* |
| 婚姻状况 | .042 | .045 | .055 | .056 |
| 政策执行公平性 | -.328*** | -.325*** | -.297*** | -.296*** |
| 生活满意度 | .006 | -.003 | .005 | -.007 |
| 体制内职业 | -.070 | -.037 | -.068 | -.037 |
| 农民职业 | .016 | -.005 | .027 | .006 |
| 个体经济地位 | -.033 | .020 | -.008 | .039 |
| 个体社会资本 | | | | |
| 乡及以上干部网规模 | | -.084* | | -.074* |
| 关系网中亲友比例 | | -.035 | | .008 |
| 拜年网规模 | | -.125** | | -.125*** |
| 社区社会资本 | | | | |
| 关系网中本村人人数 | | | -.013 | .008 |
| 本村人信任 | | | -.137*** | -.130*** |
| 社区归属感 | | | .007 | .013 |
| F-value | 8.646 | 7.716 | 7.530 | 6.919 |
| △R ² | .143 | .163 | .160 | .178 |
| adj-R ² | .127 | .142 | .139 | .152 |
| Df1 / Df2 | 10/517 | 13/514 | 13/514 | 16/511 |

注：* p<0.1, ** p<0.05, *** p<0.01。

本研究要探讨的是个体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对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的影响。在模型中，我们以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为因变量，社区社会资本和个体社会资本为自变量，同时加入政府绩效感知、性别、年龄等控制变量。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控制变量中，政策执行公平性对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有显著负向影响，年龄则对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有显著正向影响。个体社会资本方面，乡及以上干部网规模和拜年网规模对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有显著负向影响。社区社会资本方面，本村人信任对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有显著负向影响。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结果一致，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成立，因此，本研究假设 1a、1b、2b 均得到验证，总体而言，本研究的两个假设都得到了部分验证。

进一步，我们分别将 537 位受访者按照高层和基层信任落差均值为负数、接近零和正数区分出来，并观察受访者的社会属性。

表5 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值

| 样本数 | 高、低层政府信任 均值差<0 | | 高、低层政府信任 均值差接近0 | | 高、低层政府信任 均值差>0 | | 全部样本 | |
|-----------------|-------------------|-------|--------------------|-------|-------------------|-------|-------|-------|
| | 12 | | 126 | | 399 | | 537 | |
| | 均值 | 标准误 | 均值 | 标准误 | 均值 | 标准误 | 均值 | 标准误 |
| 受访者性别(1=男, 0=女) | .58 | .51 | .57 | .50 | .59 | .49 | .58 | .49 |
| 教育年限 | 7.91 | 3.90 | 5.60 | 4.28 | 5.79 | 3.89 | 5.79 | 3.99 |
| 婚姻状况(1=已婚) | .92 | .29 | .93 | .26 | .97 | .16 | .96 | .19 |
| 是否中共党员(1=党员) | .17 | .39 | .11 | .32 | .11 | .31 | .11 | .31 |
| 受访者年龄 | 44.50 | 12.86 | 47.35 | 16.15 | 52.62 | 15.00 | 51.20 | 15.40 |
| 乡及以上干部网规模 | .25 | .62 | .31 | .98 | .08 | .41 | .14 | .60 |
| 关系网中亲友比例 | .41 | .43 | .81 | .28 | .77 | .30 | .77 | .30 |
| 拜年网总人数 | 22.17 | 22.63 | 37.27 | 32.15 | 26.57 | 28.21 | 28.98 | 29.39 |
| 关系网中本村人数 | 1.70 | .84 | 2.13 | 1.35 | 1.83 | 1.21 | 1.89 | 1.24 |
| 本村人信任 | 3.25 | .75 | 4.05 | .83 | 3.55 | .73 | 3.66 | .79 |
| 社群归属感 | 67.55 | 19.08 | 72.84 | 11.49 | 70.78 | 12.94 | 71.19 | 12.79 |
| 基层政府信任 | 3.39 | .617 | 4.41 | .90 | 3.06 | .84 | 3.39 | 1.02 |
| 高层政府信任 | 2.92 | .82 | 4.41 | .90 | 4.54 | .61 | 4.47 | .73 |
| 政策执行公平性 | 2.33 | .78 | 2.91 | .70 | 2.48 | .81 | 2.58 | .80 |
| 生活满意度 | 2.83 | .72 | 3.06 | .66 | 2.95 | .60 | 2.98 | .62 |
| 体制内职业 | .08 | .08 | .053 | .019 | .012 | .005 | .02 | .01 |
| 农民职业 | .62 | .14 | .70 | .04 | .77 | .02 | .75 | .02 |
| 个体经济地位 | 1.89 | .26 | 2.73 | .07 | 2.52 | .04 | 2.56 | .03 |

统计分析显示, 537 人中, 更加信任基层政府的是占总数 2% 的 12 人, 其特征是受教育年限较高, 党员比例较高, 且年龄偏小; 除乡及以上干部网规模较高外, 他们的其他拜年网总人数、关系网中本村人数、本村人信任、社群归属感、高层政府信任、政策执行公平性感知均低于平均水平。简言之, 这类人个体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均低, 但教育、年龄、政党属性上则属于精英群体, 其政府信任却偏低, 尤其是不信任高层政府, 所以才会使得两者落差为负值。还有一类是高、基层政府信任十分接近的一群人, 约占总数的 1/4, 他们的特质可以较好地说明本研究的理论假设。相比于约占总数 3/4 的“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局的人, 其各项个体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 除关系网中亲友比例外, 都显著较高, 社会经济背景方面, 年龄显著更小, 但他们对政策执行公平性感知最好, 且对高层、基层政府信任均高, 所以两者落差很小。这一特质说明, 培育和增强个体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可以缓解“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局。

五、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试图对“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局的内在成因进行探讨。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 以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落差为因变量, 个体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作为

自变量，建构回归模型，运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时期的乡村社区资料，对假设进行验证。数据结果显示，拜年网规模越大、乡及以上干部网规模越大、对本村人信任程度越高，越会减小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的落差。概言之，有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个体社会资本有助缩小高层和基层政府的信任落差。社会资本多的个体具有较大的拜年网规模和乡及以上干部网规模，一方面，与地方官员的接触会增进其对官员所供职的基层政府的信任，他们也较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所以对政府效能持肯定态度，也因此增加了其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拥有个体社会资本多的人可能会对高层政府信任度有所降低，接触到异质性和多样化的信息，还会增进对高层和基层政府的特质及其关系的了解和反思。

其次，社区社会资本有助于缩小高层和基层政府的信任落差。对本村人信任越强的个体，其对高层和基层政府的信任越接近。因为本村人信任强的人较合群，在社区内部有良好的人缘，彼此之间信息交流也较为顺畅和充分，社区活动参与也较为踊跃。在灾后各级政府和各界大量资源注入社区的时候，他们及时知晓资讯、获得资源的可能性增大，从而提高了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另外，社区社会资本可以促成社区内合作行为，守望相助使社区活动参与者在重建过程中恢复更快，一方面他们较不依赖政府，另一方面社区合作也使政府资源更有效率与效能，从而使得占有社区社会资本高的人对政策感知较好，增加了对负责执行政策和分配资源的地方政府的信任。

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在乡村社区中个体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的缺乏是造成“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局的重要因素。一个人脉广、政府关系多、或与社区关系好的人往往有较高的政府信任度，高层与基层信任都能保持在较高水平。个体社会资本多、社区参与活跃的人，彼此互动频繁，互助多，增加合作的可能性，可有效避免社区集体活动中“搭便车”现象，^①增加集体活动的质与量。在灾后的社会情境下，合作性好的个体和社区在对接政府和各界资源时，会产生明显的综合效果，能够显著提高资源对接和使用效率，从而增进对基层政府信任；他们既保持了对高层政府“既高且稳”的信任，也缩小了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的落差。长久以来，我国乡村社区人际间呈原子化倾向，个人关系网变小变疏，社区共同活动减少。而自发性组织缺乏是造成人们对基层政府不信任的重要原因，也导致“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局。这一结论能否推广到城市社区中，尚待更多的研究。

最后，在本研究中，制度范式和文化范式被本研究操作为控制变量，社会资本范式则被区分为个体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数据结果显

^① 参见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年；E.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示，制度范式的政策执行公平性、文化范式的年龄，^①以及社会资本范式的拜年网规模、乡及以上干部网规模、本村人信任均对政府信任落差具有负向显著作用，可见上述理论范式均得到部分验证，从而印证了三种理论范式对政府信任的共同解释力。

综合社会资本对政府信任落差的影响，本研究推断，在维持对高层政府信任既高且稳的情况下，提高基层政府信任对改善“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局至关重要。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差异及其对村民个体化差别对待会形成民众对基层政府信任高低不均的格局。政府绩效与社会资本均通过影响资源分配来影响高、基层政府信任落差。个体社会资本多的人接触政府资源的渠道较通畅，与政府互动机会较多，社区社会资本高的人则在社区中有较好的公共参与度以及较多的与政府接触的机会，他们的合作行为能帮助改善政府工作的效率与效能。这一资源分配机制与社会资本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与其他学者的研究发现一致，汶川震后灾区民众对高层政府的信任始终高于基层政府，且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均呈下降态势，但到了重建完成期，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却有所提升。这是因为在灾区，政府分配资源多而频繁，所以公平感知特别敏感，这特别贴近本研究的理论，表现在这里的社会资本对资源分配的影响效果特别显著。我们推测这一理论可能适用于更大范围，研究者可利用CGSS等数据检视社会资本对政府认知的影响。

本研究还梳理出如下三期数据的社会资本统计量表，可以看到，“关系网中亲友比例”以及“关系网中本村人总数”都是先降后升，灾后初期密网变疏，但重建完成后又恢复原样。“拜年网规模”则先平后升，可见重建期扩大了个人的网络。“乡及以上干部网规模”指标在2009—2012年间则总体呈下降趋势，在震后初期，伴随着政府援助的密集施行，村民认识的乡及以上干部数量达到峰值，而一旦重建完成，生活恢复常态，年轻村民继续震前的外出务工活动，与官员的接触骤减，干部网规模萎缩。“社区归属感”整体呈上升趋势，“本村人信任”则很特别，在重建最高峰时，村民互信最高，重建完成后反而降低了，但高于震前水平，在重建中，村民嵌入社区的程度有所提升。这意味着，个人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受灾后不同时期的影响，伴随着重建的过程，村民的拜年网规模、本村人信任、社区归属感均有一定程度提升。可见，地震对汶川灾区居民社会资本和态度认知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中村民的拜年网规模与本村人信任是影响“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局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的提升，有益缩小信任落差。

^① 文化范式强调年龄越大的人受传统政治和文化的的影响越深，往往会有更高的政治信任度。

表 6 社会资本三期调查得分统计

| | 变量名 | 统计量 | 一 期 | 二 期 | 三 期 |
|----------------------------|--------------------|-----|--------|----------|--------|
| 个 体 社 会 资 本 | 关系网中亲友比例 | 样本数 | 466 | 313 | 537 |
| | | 均值 | . 82 | . 48 | . 772 |
| | | 标准差 | . 24 | . 35 | . 30 |
| | 拜年网规模 | 样本数 | 464 | 313 | 537 |
| | | 均值 | 24. 85 | 23. 39 | 28. 98 |
| | | 标准差 | 18. 98 | 26. 84 | 29. 39 |
| | 乡及以上干部网规模 | 样本数 | 466 | 313 | 537 |
| | | 均值 | . 24 | . 22 | . 140 |
| | | 标准差 | . 75 | . 60 | . 60 |
| 社 区 社 会 资 本 | 关系网中本村人总数 | 样本数 | 466 | 313 | 537 |
| | | 均值 | 1. 82 | 1. 40 | 1. 89 |
| | | 标准差 | 1. 199 | . 99 | 1. 24 |
| | 本村人信任 | 样本数 | 446 | 311 | 537 |
| | | 均值 | 3. 26 | 4. 17 | 3. 66 |
| | | 标准差 | . 55 | . 65 | . 79 |
| | 社区归属感 ^① | 样本数 | 374 | 300 | 537 |
| | | 均值 | 23. 61 | 27. 9933 | 28. 38 |
| | | 标准差 | 2. 98 | 3. 71924 | 3. 90 |

在常态化的社会中，本研究仍具有丰富的公共政策启发意义：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民生政策、法规的出台，对于维持、增进政府信任，尤其是高层政府信任具有重要意义，是构建和谐社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应有之义；政府的公共支出应向投资社会资本的方向倾斜，给予社区组织等第三部门更大的成长空间和更多的政策、资源支持，为个体和社区提供更多的沟通、互动平台和机会，促成民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渠道，提升基层政府信任，形成“双强”（央强地强）的政府信任格局；政府和第三部门应深入基层，了解不同社区及其居民的动态，通过群体和社区细分的方式，为个体社会资本少的居民提供知识、技能培训和职业流动机会，为社区社会资本少的社区提供更多的项目和资金扶持，降低个体和社区的政府信任落差，促进社会管理成效的显现。

本研究有以下现实意义：首先，有助于指导乡村社区从个体和社区两个层面建构和增加社会资本，使社区获得更多发展资源和机会，从而提升政府满意度；其次，为观察政府与社区及其民众之间的关系、建立政府与民众间良性互动机制提供有益视角，进而为维持和提升政府信任度、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参考。

〔责任编辑：刘亚秋 责任编辑：冯小双〕

① 由于第二问卷问题设计不同，因子分析后计算的社区归属感变量只能在第一、三期中计算，为对比方便，这里以三期中社区归属感主题下相同问题得分的均值作为参考。

附录

相关表

|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
| 1.政府信任差 | 1 | | | | | | | | | | | | | |
| 2.关系网中 本村人总数 | -.033 | 1 | | | | | | | | | | | | |
| 3.社区归属感 | -.013 | .140*** | 1 | | | | | | | | | | | |
| 4.本村人信任 | -.196*** | .058 | .097** | 1 | | | | | | | | | | |
| 5.乡以上 干部网人数 | -.156*** | -.018 | .026 | .107** | 1 | | | | | | | | | |
| 6.拜年网总人数 | -.157*** | .239*** | .076* | .046 | .172*** | 1 | | | | | | | | |
| 7.关系网中 亲友比例 | -.019 | .035 | .061 | .039 | .052 | -.116*** | 1 | | | | | | | |
| 8.政策执行 公平性 | -.340*** | .001 | .013 | .238*** | .114*** | -.014 | .011 | 1 | | | | | | |
| 9.生活满意度 | -.078* | .075* | .154*** | .077* | .021 | .049 | -.082* | .252*** | 1 | | | | | |
| 10.受访者性别 | .035 | -.081* | .007 | .029 | .094** | .053 | -.006 | .018 | .002 | 1 | | | | |
| 11.受访者 教育程度 | -.010 | -.019 | -.123*** | -.101** | .067 | .183*** | -.243*** | -.066 | .024 | .136*** | 1 | | | |
| 12.受访者 婚姻状况 | .116*** | -.014 | .121*** | .081* | -.048 | -.103** | .126*** | -.101** | -.023 | -.053 | -.185*** | 1 | | |
| 13.是否中共党员 | -.035 | -.102** | -.016 | .007 | .107** | .034 | -.014 | .107** | .130*** | .097** | .149*** | -.026 | 1 | |
| 14.受访者年龄 | .128*** | -.227*** | .106** | .012 | -.134*** | -.228*** | .172*** | .004 | .020 | .133*** | -.463*** | .272*** | .087** | 1 |

注: * p<0.1, ** p<0.05, *** p<0.01。

(5)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Pattern of Trust in Government When “the Center Is Strong and Local Government Weak”: Based on Third-stage Tracking Data Following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Luo Jiade, Shuai Man and Yang Kunhao* • 84 •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exert a marked influence upon the gap between trust in higher-level government and base-level government. When we introduced data on 30 villages after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into our model, we found that the size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greeting network and the cadre network at township level and above, as well as the level of trust between people from the same village,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upon the gap between trust in higher and lower levels of govern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is conducive to creating a balanced level of trust in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with effective cooperation have more channels for solving their own livelihood problems, and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ir exploitation of resources and increas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with government in their contacts with resources from different quarters and with government. This enhances their trust in base-level government and decreases the gap between trust in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6) A Chinese Path to Bringing the Demarcation of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Rule of Law *Liu Jianwen and Hou Zhuo* • 102 •

Facilitating the normalization and legalization of government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at all level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deepening fiscal and tax reform and building finance and tax governed by the rule of law. At the legal level, China should specify the demarcation of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among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and should use legal mechanisms to encourage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to exercise these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to ensure that they do so. Government is endowed with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citizens' basic rights. On the premise of clarifying the boundaries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it uses legal means to define the range of these responsibilities and pow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restraint. The economic standard for the demarcation of powers is even more fundamental; the consequent demarcations are subject to adjustment by legal standards. Government powers can be divided into legislative oversight and regulation and the exercise of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e disposition of legislative oversight and regulation under the existing legal system is relatively rational, but its powers, especially of its judicial powers, should be appropriately concentrated 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evel. The exercise of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existing system leaves room for the demar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s, and the homogenization of powers among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is quite noticeable. Bringing the demarcation of powers under the rule of law requires the formulation of basic financial law in such a way as to specify the power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The division of financial powers among governments, optimization of the transfer payment system and the achievement of hard budget constraints ar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